



“宗唐得古”说献疑

——兼谈戴表元诗论的特色及地位

魏崇武

摘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元代文学史》所提出的“宗唐得古”概念影响很大,但却不甚妥当。该书将“得古”连读,是在词性上出现了误判;而学界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宗唐以得古”,则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戴表元宗唐复古主张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宜提得过高,“酿蜜”说才是其诗论的真正特色和价值所在,应予以重视。

关键词:戴表元;宗唐得古;酿蜜说;元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2-0084-08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元代文学史》自1991年问世以来^①,在学界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尤其是有关元代诗文创作的七章内容,更是引领了相关研究的热潮,贡献不小。在这股热潮中,一个由《元代文学史》率先提出的概念——“宗唐得古”,迄今为止仍被元代文学研究者广泛使用。然而,此说影响虽大,其实并不妥帖,但长期以来未见有人稍加指出,更无人专门撰文辨析。个别学者似有警觉,但也仅在其研究中回避使用而已,多数学者则习焉不察。有鉴于此,笔者将自己一直以来对此说的疑惑提出来,并试作辨析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究竟什么叫“宗唐得古”?“宗唐”不陌生,但“得古”就比较冷僻了。文学研究经常讲“复古”“崇古”“尚古”“拟古”等等,讲“得古”的实在少见,似乎只有研究元代诗歌及元代诗论者使用。这显然是受《元代文学史》影响而出现的现象。该书第十七章“元代诗文概况”第一节“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正文内容一共出现九次“宗唐得古”字眼,今胪列如下:

1. 戴表元提倡“宗唐得古”。(p368)
2. 袁楠是戴表元的学生,继承了他老师“宗唐得古”的主张。(p369)
3. 如果说赵孟頫和袁楠先后进京,代表着南方的“宗唐得古”诗风传入北方,从而和北方的复古诗风汇合,那么,到了延祐年间,这种汇合的复古诗风就成为席卷诗坛的汹涌澎湃的潮流。(p369)
4. 元诗的发展以仁宗延祐年间为界,可分作前后两期,延祐以前宗唐得古诗风由兴起到旺盛,延祐以后宗唐得古潮流继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后期的成就超过了前期。(p370)
5. 就整体而言,宗唐得古成为支配有元一代诗坛的潮流,因此元末人有“举世宗唐”之说。(p370)

^①以下本文所举该书例证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版、1998年2印本。

6. 对元代诗坛的“宗唐得古”潮流及其造成的结果,后人评价不太一致。(p371)

7. 元诗的“宗唐得古”当可视为是一种“复古”潮流。(p374)

8. 元代的宗唐得古潮流既然主要针对的是宋诗的弊病,也是为了纠正宋代理学家鄙薄诗艺的偏颇,因此也就具有以复古为“新变”的性质,而不是消极意义上的拟古。(p374)

遗憾的是,上述文字始终没有对“宗唐得古”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在该书第 365 页中,却又有这样一段话:

在元诗的发展过程中,宗唐复古(即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成为潮流和风气,其间经历了从前朝诗风的反思和批判,经历了南北复古诗风的汇合,这是元诗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p365)

书中倒是以括注方式对“宗唐复古”作了补充说明。然而,该书大量使用“宗唐得古”的提法,甚至以之作为小节的标题,难免让人心生疑惑:“宗唐得古”与“宗唐复古”是否等同?若是等同,为何不使用“宗唐复古”这一较易理解的提法?若不同,这两个概念在具体使用上如何区分?还有,“宗唐”与“得古”之间究竟是并列关系、递进关系,还是目的关系?笔者发现不少研究者在使用“宗唐得古”概念时相当混乱,有的视同“宗唐复古”,有的却又解释为“宗唐以得古”。若是“宗唐以得古”,那么此“古”何“古”?此“古”若指古体,“得”作何解?所谓“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否戴表元的观点?此“古”若指古风古韵、古意古态,为何元代诗人非要通过宗唐以“得古”,而不直接宗先唐?诸如此类的疑惑,如不从源头上予以廓清,恐怕难以解开。

二、“得古”之辨析

《元代文学史》“宗唐得古”之说显然是源自戴表元(1244—1310)的两篇诗序:《洪潜甫诗序》和《张仲实诗序》。特别是前者,为更直接的渊源。然而,“得古”一词恐是误读所致。我们且来看看《洪潜甫诗序》:

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其博瞻者谓之义山,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圣俞不为。然及其久也,人知为圣俞而不知为唐。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鲁直不为。然及其久也,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非圣俞、鲁直之不使人为唐也,安于圣俞、鲁直而不自暇为唐也。迩来百年间,圣俞、鲁直之学皆厌,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益不暇为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①

段末“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乃关键所在。是“安得”连读还是“得古”连读,意思不一样。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必须先分析一下“唐”字。综观这段文字,戴表元通过回顾宋代诗歌发展历程,高度肯定了唐诗的成就。这里面反覆出现“唐”字,加以厘分,主要可以分为“可唐”、“为唐”两组,其词性、词义并不一致。“可唐”之“唐”应为动词,指具有唐诗风貌或达到唐诗水准。“为唐”之“唐”应为名词,指具有唐诗风貌或达到唐诗水准的诗歌;“为”则意指“创作”。那么,“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中的“唐”和“古”对举,均应为名词,而“古”之前实际上承前省略了一个“为”字。因此,将此文的“得古”连读,显然不妥。

《张仲实诗序》也出现了“安得古”的字样。该文为读者展现了宋末元初江南诗坛关于唐诗的对立态度:一方是所谓“搢绅先生”,他们原先深受科举影响,不屑作诗,对学习唐诗者大加讥讽。后来科举废除,致力于作诗,试图学习唐诗而不能精,便继续贬低唐诗而侈谈宗古。他们将“古”与“唐”割裂开来,“惧不达于古,不惧不达于唐”,认为唐诗不古。另一方则是坚持宗唐的诗人,他们认为“古固在我”,唐亦是古,并抗言:“君安得古?”这里的“古”应指古风古韵,其前省略了动词“有”或“谓”等。因此,将此文的“得古”连读,显然也不妥。

①戴表元.戴表元集.李军,辛梦霞,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95.

相反,“安得”连读,较为符合语言习惯。一般说来,“安”字除了用作形容词、动词之外,主要还用作疑问代词和副词。作疑问代词时,可作宾语;作副词时,可作状语。不管是作宾语还是状语,“安”与其后紧接着的不少动词或介词在结构上比较紧密,往往连读有如词组,如“安能”、“安敢”、“安有”、“安得”、“安知”、“安归”、“安在”等等,现在就有专门讨论杜诗中“安得”一词的学术论文^①。此外,就“得”字而言,虽有不少义项,但置于“安”字之后,主要有以下三个义项:一个是“获取”、“得到”,一个是“有”,这两个均为动词,在此归为A类。为了与下文不重复,今略举《戴表元集》之外的著名例子,比如: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安得广厦千万间/……

还有一个则是“能够”、“可以”之意,属于能愿动词,在此归为B类。《戴表元集》中有不少例子,略举数句如下:

安得聆度外之谈乎(《送陈养晦远游序》)/又安得以今之鲁狂拟昔之蜀庄者乎(《逊斋铭》)/
吾安得不愧且惧乎哉(《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既能露文章,匠手安得辍(《阙风舒先生客居
棠溪袁仲素家见示竹帘诗戏作问答二首》)/……

与“得”字上述三个义项相关的两类“安得”,其区别在于:A类“安得”,实际上暗含着“能够”之意,一般都可以解作“怎么能够得到(有)”或“怎么才能得到(有)”,句式主干结构往往为“安得+名词或定中短语”;B类“安得”可以直接解作“怎么能够”、“怎么可以”等,但“得”字仅仅为能愿动词,所以句子必须另有动词,句式主干结构往往为“安得+动词或述宾短语”。但无论哪种结构,由于前有“安”字的存在,人们都习惯将“得”字与之连读。比如“子安得而知之”(《送曹士弘序》),戴表元在“安得”与“知之”之间加了一个“而”字,也可说明这一点。

整部《戴表元集》,“安得”共出现32处^②。除了上述两篇诗序的2处后接“古”字者之外,还有30处“安得”散见于29篇(首)诗文之中。由于《元代文学史》将“得古”连读并与“宗唐”并列,说明它把“得”字视为动词,将其句式结构视为“安得+名词”。那么,我们姑且将剩下30处“安得”之“得”为“获取”、“得到”或“有”之意者挑出来分析,看看会怎样。经过筛选^③,只有以下2例较为接近我们的要求:

1. 私叹安得琼台玉宇者而辱仙人居之(《计筹山升元报德观记》)
2. 安得知过服义如子路者而与之语哉(《子路使子羔为费宰》)

然而,这两例的句式都不是简单的“安得+名词”结构,而是“安得”后连接助词短语“……者”,再接连词“而”,又再接短语(例1为兼语短语,例2为状中短语)这样较为复杂的结构。

以上分析表明,《戴表元集》并无其他与“安得古”在表面结构上完全一致的句子,那么我们对“安得古”的解释就得倍加小心。我认为,《洪潜甫诗序》“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和《张仲实诗序》“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的“古”字之前,均承前省略了动词,那么这两篇文章中的“古”字实际上是用作动词,“得”字也就只能视为能愿动词,而不可解作“得到”、“获得”或“有”。因此,将“得古”连读,甚至引申为“宗唐以得古”,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戴表元对“唐”“古”关系的认识

既然《元代文学史》“得古”的说法有欠妥当,那么该书“宗唐复古”概念又如何?遗憾的是,《元代文学史》对“宗唐复古(即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的解释依然有些问题。戴表元虽然赞同宗唐,也主张复古,但翻遍整部《戴表元集》,我们也没有找到他从体裁角度来谈诗歌如何“宗唐复古”的文献。更何况,“宗唐”是否仅限于体裁(“近体”),“复古”能否等同于“古体宗汉魏两晋”?

其实,与戴表元同时代的诗人仇远(1247—1326)曾说过:“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④《元

①潘殊闲.试论杜甫的“安得”情怀.杜甫研究学刊,2009,101(3).按,该文统计出“安得”在杜诗中一共出现28次之多。

②按,李军、辛梦霞校本《戴表元集》是目前收录戴表元诗文学作品最全的版本,本文以之作为统计和引用依据。

③比起散文,诗歌词性更为灵活,句子成分缺省现象更为常见,不适合本文的取样分析,故舍去(共11处)。

④方凤.仇仁父诗序//李修生.全元文:第10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655.

代文学史》也引用了仇远的这一说法，也许该书正是因此而以“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来解释“宗唐复古”的，但这一解释显然外延过窄了。“宗唐复古”应该是包括但不限于“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元代文学史》以“即”字来表明二者的对等关系，这同样是不妥当的。此外，按《元代文学史》的解释，“宗唐复古”就变成了“宗唐”与“复古”并列的集合体，这依然是不妥当的。

那么，既然不宜将“得古”连读，也不宜将“宗唐得古”理解为目的关系（“宗唐以得古”），又不宜将“宗唐复古”视为并列关系（“宗唐”和“复古”）且不宜使之外延过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那么《元代文学史》在相关章节上颇有重写的必要。

关于元代诗歌的“宗唐复古”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①，本文不拟展开。只是，《元代文学史》从戴表元文章中拈出“宗唐得古”作为章节标题，颇给读者以一种戴氏诗论牢笼全元的错觉，因而还是有必要对戴氏诗论做些分析。

戴表元眼中的“唐”和“古”是何种关系？从《洪潜甫诗序》“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来看，从“唐”到“古”显然是递进的。而且，《张仲实诗序》还这样说：

诗自盛古至于唐，不知几变，每变愈下。而唐人者，变之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寝处之物、玩适之器不暇及古，虽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遗缣断楮、废材败絮，数百千年间物，即古之疑。其攻能精绝，亦喟喟叹美，以为不可及。至于为诗，去唐远甚，然谈及之，则不以为古。诚古不止此，抑充其类焉，姑无深诛唐乎！

虽然从“古”到“唐”，诗歌的古风古韵不断递衰，但“唐”其实也可纳入“古”的范畴，那么“古”与“唐”还有一层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因此，戴表元对于将“唐”与“古”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很不赞同的。此篇序文对张榘（字仲实）有所劝勉。张榘（1260—1325）居杭州，与戴表元交往密切。其岳父牟巘（1227—1311）称其“诗以少陵为法”^②，看来是个宗唐的诗人。但从《张仲实诗序》来看，张榘似乎受到当时杭州诗坛宗“唐”派与贬“唐”尚“古”派之间争执的困扰，以至于“能为唐而不为唐”。戴表元希望张榘能够坚定信念，继续向唐人学习，并鼓励其上溯先唐。不过，对于究竟何为“古”诗以及如何创作出符合理想的“古”诗，整个《戴表元集》并无具体的表述，甚至连虽较为笼统但具有针对性的话也没有。倒是元末杨维桢有句笼统的话，似替戴表元道来：“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③

张榘的确是一位好古者。他与邓文原（1259—1328）年龄相仿，情同手足，邓文原曾“分一室共居，而题其扁曰‘学古斋’，相与读书玩义理于其中，如此十年”。戴表元为其作《学古斋记》，讲外在的器物、礼仪、制度等等既难以真正复古，也没有必要，如果一定要做，更应做的是“古其中”^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讲戴表元是个复古主义者，在诗歌方面也是如此^⑤。从《戴表元集》中可以看到，戴表元对于宋代的诗人和诗歌虽有批评，但也给予了不少肯定，那么，不仅“宗唐得古”的提法不正确，即便“宗唐复古”也不能很好地突出戴表元个人的诗学特色，虽说他的确赞同宗唐复古。也许，“酿蜜”说才是戴表元诗论的真正特色和价值所在，钱基博先生《中国文学史》在论及戴表元诗文创作时，首先即提“酿蜜”说，可谓独具慧眼^⑥。近些年来，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在讨论戴表元文学思想时涉及到“酿蜜”说，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

①按，专著有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专以元诗“宗唐”为题的期刊论文也有十多篇，此外还有不少成果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涉及。其中，史伟《元诗“宗唐得古”论》（《求索》，2006，163（3））一文对元诗宗唐之特点及旨趣的剖析细致深入，刘克飞《略论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可能——以语义学分析为线索》（《武陵学刊》，2013，159（2））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宗唐得古”说的理论能力常被无限制地扩展的问题，颇见精彩。可惜这两篇佳作的作者均未察觉“得古”一词存在的问题。

②牟巘《张仲实诗稿序》//李修生。全元文：第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579。

③杨维桢《赵氏诗录序》//李修生。全元文：第4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239。

④戴表元《学古斋记》//李军，辛梦霞。戴表元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26；王沂。张君仲实行述//李修生。全元文：第6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82-185。

⑤戴表元屡言自幼好古，比如《容膝轩记》：“始余读书，则尝想象古人居处、服食、动作、百物之态，以质诸书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之，合然后已。”（李军，辛梦霞。戴表元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30）但后来，他放弃了外在的模仿。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如《芷屋记》讲“夫学《骚》人，无庸以名物为主，亦聊取其志而已”（李军，辛梦霞。戴表元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39），等。

⑥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781。按，当今学者只有张晶《论戴表元的诗学思想及其在宋元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地位》、查洪德《综百家之说，开一代风气——戴表元的理学与文学》等少数几篇文章对“酿蜜”说给予相对多的重视。

集中在其宗唐复古观念上,对“酿蜜”说的关注较为欠缺,所以仍需多加强调。

四、“酿蜜”说:戴表元诗论的真正特色

周振甫先生《中国文章学史》倒是也对“酿蜜”说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但他所称赞的人不是戴表元,而是吴澄:

元人在写作法上,确有提出新的见解,超过前人的。这是吴澄所提出的化的境界,要像蜜蜂的采花酿蜜,但蜜中已看不到百花,已化为蜜了。这比韩愈的“惟陈言之务去”,柳宗元的有取于诸经和子史更高。^①

可惜明代的前后七子,没有注意到吴澄的这篇文章,他们要袭秦汉之语以为文章,所以失败了。吴澄……这样讲从读书到创作,是新的创作论,是高出于明人之见的创作论。^②

吴澄(1249—1333)《送郭以是序》一文讲读书与创作的关系时,的确也以“酿蜜”为喻:

夫所贵乎读书者,非必袭其语以为吾文也。蜂之酿蜜,不采取于花,可乎?融液浑成而无滓,人见其为蜜,而不见其为花也。世有博记览者,其发于声,形于言,乃或窒塞而不通,固滞而不化,观者厌之,则谓曾不若空疏者之谐协畅达也。噫!是岂书之能累夫文哉?^③

可惜周先生没有注意到戴表元也有相似的观点。戴表元《蜜谕赠李元忠秀才》说:

酿诗如酿蜜,酿诗法如酿蜜法。山蜂穷日之力,营营村廛藪泽间,杂采众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咸甘苦之味无可定名,而后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嚼其所从来,则不为蜜矣。^④

结合其下文,可知此段话表达了戴表元对师法前人创作的原则性认识,与吴澄的观点大同小异。以上两篇文章难以考订出具体创作时间孰先孰后,戴、吴二人也没有交集^⑤,各自的文集在生前并未流传,相互之间不大可能产生影响。戴比吴年长五岁,去世也早了二十三年,在我们推测“酿蜜”说的首倡者时并不处于劣势。因此,周振甫先生的高度称许不仅同样适用于戴表元,甚至可能更应该用于戴表元。

从“酿蜜”说来反观宗唐复古,可知无论是“唐”还是其它,都只是待采的花。虽说《蜜谕赠李元忠秀才》一文列举了宋人最为注重学习的陈子昂、杜甫、白居易、贾岛、许浑、李商隐等多位唐代诗人,但若据此认定戴表元专门提倡宗唐而不及其馀,岂不与其主张“杂采众草木之芳腴”、反对“偏主一卉”的说法相矛盾么?何况,在《李时可诗序》一文中,戴表元还这样说:

(李时可)为诗必拟古,自近古名能诗人陶谢以来之作,规模略尽,故下笔辄无今人近语。

时可之于诗,其视余,殆可谓莫逆于心者耶?^⑥

从所谓“莫逆于心”,可知戴表元与李鸣凤(字时可)志同道合,对其师法古人持肯定态度,未曾专门强调宗唐,与那些囿于宗唐而声称“古固在我”者的态度大相径庭。另外,结合《洪潜甫诗序》等文来看,戴表元对宋代有成就的诗人有不少正面评价,他批评的只是那些眼界囿于宋诗的人。对被视作江西诗派殿军的方回(1227—1305),戴表元称扬这位前辈“平生于诗无所不学。盖于陶、谢学其纤徐,于韩、白学其条达,于黄、陈学其沉鸷,而居常自说欲慕陆放翁”^⑦,因而所作“大篇清新爽朗,天趣流洽,如晋宋间人醉语,虽甚褻,不及声利;小篇沉鸷峻整,如李将军游骑远击,自成部伍”^⑧。可见,无论是“先唐”还是

①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80.

②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89.其实“后七子”中的谢榛倒也讲到过“酿蜜法”(谢榛.四溟诗话: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15),不过学界一般认为他的诗学见解与李攀龙、王世贞等有分歧。谢榛之后,明代还有其他人以“酿蜜”为喻,如叶向高、朱之瑜等,但确实不多见。

③李修生.全元文:第1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29.

④戴表元.戴表元集.李军,辛梦霞,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272.

⑤赵孟頫曾在《送吴幼清南还序》中向吴澄介绍过友人戴表元、邓文原等,但从现有材料看,吴后来与邓成为好友,与戴则没有交集。

⑥戴表元.戴表元集.李军,辛梦霞,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90.

⑦戴表元.桐江诗集序//戴表元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87.

⑧戴表元.方便君诗序//戴表元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87.

“唐”、“宋”，只要是能酿“蜜”的“花粉”，戴表元都赞成去采，并不“偏主一卉”。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未提及“酿蜜”说，但他特别指出戴表元诗论“不主一格”、“所谓复古，也有一种很通达的看法”^①，这也可证明“酿蜜”说确实才是戴氏诗论特色所在，而其《许长卿诗序》“无迹之迹，诗始神”的观点则是“酿蜜”说的不同表达。至于朱荣智《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所论列戴表元的批评理学兴而文艺绝、标举唐音、谓诗学如学射般熟能生巧、强调诗穷而后工等诗学观点或主张^②，不能说不正确，但都不如“酿蜜”说更能体现戴表元诗论的特色和价值。而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认为戴表元诗论“皆有可取，又皆非新意。略之似可惜，表之又少趣”^③，颇有道理，但恐怕也是没有注意到“酿蜜”说吧。

此外，从思想上来看，戴表元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但又理学气味不浓；坚持儒学本位，却又不排斥佛老，显得较为开放。在行动上，宋亡之后既不热衷于出仕，但也不拒绝出任儒学教授；在个人交往中，周密与方回为死对头，但戴表元与二人均关系良好^④。等等。这些思想行为，与他的“酿蜜”说明有内在的一致性。

五、戴表元诗论地位之再评价

由于《元代文学史》从戴表元文章中拈出“宗唐得古”作为重要概念反复陈说，客观上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于戴表元的重视，迄今为止，有关戴表元的基础文献、生平、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研究乃至以戴表元为考察中心的宋元之际文人心态研究等方面的期刊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已有三十多篇，其中查洪德、杨亮等学者的观点颇值得参考，而刘飞的博士学位论文《戴表元及其文学研究》则用力最多，持论也较为平允。然而，部分论文对戴表元个人诗论的评价，颇有定位过高之嫌，比如称戴表元“宗唐得古”观点为元代诗坛一面最耀眼的旗帜、戴表元诗论为有元一代诗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等等。

其实，宋代有见识、有成就的诗人一直都是既向本朝诗人学习，也向唐及先唐诗人学习。然自南宋以来，在江西诗派大盛之后，出现“知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的现象，杨万里批评说“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谓之知江西者”^⑤。从金、宋后期到蒙元初期，有鉴于南宋诗坛出现的弊端，不少人先后提倡诗歌宗唐复古，并亲身实践，从而掀起一股宗唐复古的潮流。

在南方，按袁桷(1266—1327)的说法，是南宋中期永嘉四灵起而“唐声渐复”(《书汤西楼诗后》)^⑥。可见四灵后来虽沦为批判对象，但对于突破江西藩篱、倡导宗唐是有贡献的。不过，在四灵之前，早已有陈与义、吕本中、曾几、陆游、杨万里等等逐步摒弃“闭门觅句”之习，努力从现实生活、从唐诗等吸取营养以求突破。之后，又有严羽、戴复古、刘克庄等提倡宗唐复古。刘克庄甚至还一度想抛弃近体创作而专门创作古体，与后来戴表元所讲的“能为唐而不为唐者”相同，但被赵汝谈所劝止^⑦。由宋入元，与戴表元同时代者如牟巘、方回、方凤、谢翱、赵孟頫、邓文原等也从各自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提倡宗唐复古^⑧。可见自南宋中期以来到宋元之际，南方诗坛已经形成了一股宗唐复古思潮。戴表元在其中虽然算得上较为重要的人物，但若过分突出其宗唐复古主张的地位和影响力，似乎缺乏事实上的依据，而且容易给人造成戴表元为有元一代宗唐复古旗手的印象，定位明显过高。

①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下册.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123.

② 朱荣智. 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 台北: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2: 198-201.

③ 成复旺, 黄保真, 蔡钟翔. 中国文学理论史: 第2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7: 569.

④ 杨亮认为戴表元无遗民情结, 国家意识淡漠, 对气节并不看重, “对政治采取一种实用而又漠然的态度”(杨亮. 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心态臆测——以舒岳祥、戴表元为例.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第25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44)。刘飞也认为戴表元对时政缺乏关心, “在对世事的参与上显然是不够的”(刘飞. 世人羨桃源, 桃源何处有——戴表元诗歌的隐逸主题剖析.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04(2): 22)。以上见解有一定道理。不过, 上述两篇文章都没有提到戴表元《春秋法度编序》一文。其实, 该文一反南宋以来以《春秋》为“复仇之书”的通行看法, 提出“复仇之说, 初非《春秋》本旨”, 认为警示乱臣贼子、劝勉用夏变夷才是《春秋》本旨(李军, 辛梦霞. 戴表元集.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71), 这透露出戴表元对于蒙古朝廷的态度。

⑤ 杨万里. 双桂老人诗集后序//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238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199.

⑥ 李军, 施贤明, 张欣. 袁桷集: 下册.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 678.

⑦ 刘克庄. 瓜圃集序//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329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81-83.

⑧ 即便如方回论诗专崇江西一派, 但他却推尊杜甫为“祖”。

在北方,长期笼罩在苏黄影响下的金朝诗坛,贞祐南渡前已有党怀英“诗似陶谢,奄有魏晋”^①,尹无忌“不喜苏黄”“一以李杜为法”^②,等等。南渡后,更是形成了宗唐之风^③。据记载,赵秉文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④。此外还有李纯甫也师法卢仝、李贺^⑤,辛愿“得少陵句法”^⑥、杨弘道“以唐人为指归”等等^⑦。其中,元好问以“北人不拾江西唾”宣告了对江西诗派的否定^⑧,还以理论著作兼资料汇编《杜诗学》、选本《唐诗鼓吹》等对唐诗作进一步的宣扬。

在金、宋末年和元初的南北方一片宗唐复古之风中,戴表元既不像前辈们如北方元好问、郝经等和南方方回、刘辰翁等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和选本,其诗文集中的诗论内容虽不算少,但过人之处不多,诗歌创作也未能取得如同时代的南方赵孟頫、北方刘因等的成就,因此从总体上讲,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戴表元诗论的影响和地位。

时至今日,部分学者也已意识到应将戴表元诗论放在当时的诗坛潮流中来认识,但一般仍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然而,如果我们结合戴表元诗文集的流传情况看,可能会对已有的评价(即便不是极度拔高的)打个不小的问号。据《戴表元集》的附录资料,参考该书《前言》以及刘飞《戴表元著述及其流传考略》一文^⑨,可知戴表元虽在生前已将其诗文手订结集,但终元一代,未见流传。其门人袁桷虽曾募集资金,但似乎未能成功刻印。宋濂早年常听其师黄潘称颂戴表元诗文,遂多方访求,而未能如愿。直至明初修《元史》,宋濂专门遣人寻访,才从鄞县戴表元后人处得到二十八卷本《剡源文集》,由国子学正夏阅、戴表元孙戴资先于洪武四年(1371)八月刊行,这时距离戴表元去世已经超过六十年了。我认为,虽然通过好友赵孟頫、门人袁桷等,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戴表元的名声,但《剡源文集》长期未见流传,无疑也会大大削弱戴表元在文坛上的影响力。在戴表元生前,赵孟頫(1254—1322)《奉和帅初将归见简》就为其惋惜:“戴子文章伯,不为时所知。”^⑩据孙蕡侯《宋元戴剡源先生表元年谱》,赵诗作于大德五年(1301)冬^⑪,此时戴表元已经五十八岁,离去世不到十年。而在戴表元死后,柳贯《跋文长老所藏曹泰宇戴帅初诗》说:“戴先生下地且二十年,前修浸远,后武亦稀,虽近在州里,语其姓名,或吃吃不能答者有矣。”^⑫宋濂《戴剡源先生文集序》也说:“先生之没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⑬元人所编的多部总集均未选入戴表元作品,如《谷音》、《天下同文集》、《元文类》、《元风雅》(傅习、孙存吾编)等^⑭,而蒋易所编《元风雅》卷八亦仅收戴表元诗三首,可见戴表元在元代并未受到重视。另外,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旨赴江南访贤,在当今学者勾勒出的将近三十人名单中,未见戴表元名字,这对于我们了解戴表元在当时的实际地位和影响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戴表元诗论的主要特色和价值应该在“酿蜜”说上,其宗唐复古之主张,地位和影响力不

① 赵秉文. 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第11卷//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 刻本. 湖北:海丰吴重熹,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

② 刘祁. 归潜志. 北京:中华书局,1983:86.

③ 狄宝心《金与南宋诗坛弃宋宗唐的同中之异及成因》认为金人“在分疆界宋上不像南宋那样门户之见势如火水,呈现出宗唐而不废宋的态势”(文学遗产,2004(6):92-93)。

④ 刘祁. 归潜志. 北京:中华书局,1983:85.

⑤ 刘祁. 归潜志. 北京:中华书局,1983:87. 不过,李纯甫晚年又喜杨万里诗。

⑥ 刘祁. 归潜志. 北京:中华书局,1983:15.

⑦ 元好问. 杨叔能小亨集引//姚奠中. 元好问全集(增订本):上册.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762.

⑧ 元好问. 自题《中州集》后//姚奠中. 元好问全集(增订本):上册.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321.

⑨ 古籍研究,2003,44(4):32-36.

⑩ 杨镰. 全元诗:第17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3:231.

⑪ 孙蕡侯. 宋元戴剡源先生表元年谱.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74.

⑫ 柳贯. 柳贯集:下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524.

⑬ 戴表元. 戴表元集. 李军,辛梦霞,校点.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543.

⑭ 按,戴表元本身也不能归为遗民,《谷音》不选他属于正常。《天下同文集》现存为残本,也许有些不足为据。但《元文类》选刘辰翁、赵孟頫、邓文原、袁桷等等,却不选戴表元,则值得玩味。刘飞《戴表元诗歌丛考》指出,明清时期一些重要选本虽选入戴表元诗作,但其入选诗作在现存诗作中所占比例不高,明清诗话对戴表元及其诗作也不甚重视(古籍研究,2005,47(1):22-23)。不过,黄宗羲则相当推崇戴表元的散文,编有《剡源文抄》四卷。

宜提得过高^①。

六、结 语

自《元代文学史》问世以来,尤其是随着新世纪《全元文》《全元诗》及大批元人别集、总集的整理出版,元代诗文及诗文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进展,翟朋、邱江宁等学者的研究综述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②。然而,不管是哪个学术领域,也不管其进展如何,保证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在学理上的正确,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更何况,经过这些年来年的发展,也到了适当重新审视已有成果的时候了。著名学者杨镰先生在去世前正着手修订其出版于2003年的《元诗史》,更何况是1991年问世的《元代文学史》?因此,笔者不揣愚陋,就《元代文学史》中影响很大的“宗唐得古”说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戴表元诗论提出一己之见,希望能对将来的修订或重写工作有所裨益,也希望能为将来本领域的研究提供更牢靠的基础,欢迎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A Discussion on “Imitating Poems of Tang Dynasty and Reviving the Poems’ Style in Han and Wei Dynasty”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of Dai Biaoyuan’s Poetics

WEI Chongw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Literatur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written by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dvances the concept of “Imitating Poems of Tang Dynasty and Reviving the Poems’ Style in Han and Wei Dynasty”. This concept has a great influence, but it is not desirable. The book comprehends aforesaid concept by juxtaposing the word “de” (得) and “gu” (古). It is illogical for academic extend the meaning of this concept. They regard it as “Imitating Poems of Tang Dynasty to Revive the Poems’ Style in Ancient China”. The author recommends that the influence and status of Dai Biaoyuan’s proposition of “Imitating Poems’ Style in Tang Dynasty” shouldn’t be highly regarded. His theory of “Gather Honey” has real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

Key words: Dai Biaoyuan; Imitating Poems of Tang dynasty and Reviving the Poems’ Style in Han and Wei dynasty; theory of “Gather Honey”; literature in Yuan dynasty

● 收稿日期: 2016-09-06

● 作者地址: 魏崇武,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875。Email: weiwu@bnu.edu.cn

● 责任编辑: 桂 莉

① 与之相似的有严羽《沧浪诗话》。对于这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很高地位的诗话著作,张健通过厘清其成书过程,认为“事实上在宋元时代,严羽的影响并不很大”,“只是到了明初,……严羽的诗学才走出福建而影响整个诗坛”(张健,《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北京大学学报》,1999,36(4):70-85)。不同的是,戴表元诗论不仅在宋元时期影响不大,即便到后来,其地位也不宜提得过高。

② 翟朋,新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的审视与思考,《民族文学研究》,2013,136(5);邱江宁,唐云芝,近十年元代诗文研究述要,《江苏社会科学》,2015,282(5)。